

乡村兽医去哪儿了?有证的多到城里看宠物去了

基层兽医工作体系不完善,从业人数不足质量不优地位不高,急需改善

本报记者梁军、任延昕

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,人类现存已知的传染病中有60%属于人畜共患疾病,至少有75%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。

兽医是预防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前端。近两年非洲猪瘟的传播,暴露出我国动物防疫系统仍有薄弱环节,兽医工作体系还不完善,从业人数不足、质量不优、地位不高。

业内人士呼吁,我国要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病,必须坚持“人病兽防”,让兽医成为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“预警人”。

上得了实验室也下得了牛棚里

隆冬,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家养殖场里,撒料机嗡嗡作响,奶牛吞嚼着草料。

39岁的乡村兽医沈俊康套上雨鞋,穿好防护服,在一旁等待奶牛吃完早餐。经过雾化消毒后,他和两名村级防疫员进入牛栏,开始抽样采血。

一头奶牛的采血过程通常需要三人配合,一人固定,一人采血,一人编号。等完成采血任务,牛棚里已尘土飞扬,一股混合着牛粪的药液气味掠过,冲入人的鼻孔。

“手速快,能最大限度降低奶牛的应激反应,同时保护我们的自身安全。”沈俊康说。他从业25年,经常被牛踢伤。

沈俊康将血样逐个标记、装箱,这时手机响了起来:有养殖户要卖家里的畜禽,需要办理产地检疫合格证,然后装车转运。“这可耽误不得。”他说,产地检疫合格证就是动物的“健康码”,也是各类畜禽在市场自由流通的前提条件。

十几公里外,榆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,33岁的陈正博身披白大褂,正在对送检的动物血样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病理学分析。

跟沈俊康不同,陈正博大部分时间都“窝”在实验室,与同事负责全县重大动物疫病的日常检测和动态预警。这个实验室是在2009年建成的,检测能力覆盖全县,年检测量可达3万份。

牛羊得了什么病?该怎么治?疫苗起没起作用?这些养殖户最关心的问题,都可以从他们实验室里找到答案。

像沈俊康和陈正博一样,基层兽医是能够诊治多种动物疫病的“多面手”。他们有的防护服从头穿到脚,使用先进仪器给牲畜采血、上报信息;有的坐在实验室电脑前,分析各类数据信息,指导养殖场科学饲养、及时防疫。

牛棚里穿防护服,实验室里穿白大褂。兽医们两种不同的“打开方式”,构成了基层动物疫病的防护屏障。

“鸟枪换炮”后不再“灰头土脸”

沈俊康的父亲年轻时就是夏官营镇的乡村兽医。那时候家家户户没有电话,也没有大规模



1月24日,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家养殖场里,乡村兽医正在给羊采血。受访者供图

的养殖企业,各家各户就一两头牲口,一头牛生了病全家人跟着着急。一有求医的农户找上门,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去看病、打针。

在他儿时记忆里,父亲总是背着药箱行走在乡村猪舍间,深一脚浅一脚,猫着腰走进猪舍,与养殖户一起捉猪,给猪打防疫针。

“受制于当时的治疗技术和养殖水平,大部分时候,一名乡村兽医能做的很有限。”陈正博说。

多年前,陈正博的父母从事养殖业。父亲从定西市采购了一批仔猪,由于防疫检查没到位,买回来后发现了传染病。当时死了40头猪,经济损失达两万元。父母深受打击。

近年来,随着养殖业高速集约化、规模化发展,甘肃不少农村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。新时代乡村兽医们的工作环境大为改善,“鸟枪换炮”后不再“灰头土脸”。以前侧重打针看病,如今更加倾向于实验室检测,注重预防和保健正成为兽医行业的趋势。

新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。伴随新型畜禽病毒出现,结核病、布鲁氏菌病等动物源性传染病不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。而气候变化、生态环境退化以及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,给动物疾病的防控带来巨大挑战。

陈正博说,甘肃省是畜牧业大省,近年来很重视县级实验室的能力建设。2020年全国非洲猪瘟防控政策要求,跨省市调运仔猪、种猪,当

地兽医部门需要出具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报告。这一年碰巧榆中县生猪出栏多,幸好县级实验室就可以做病原学检测,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到上级动物疫病控制中心检测。

“兽医的力量正在不断完善,养殖户的疫病预防意识增强了,也更加依赖我们了。”陈正博说,虽然工作过程艰苦乏味,但他依然热爱这个岗位,2019年他还被授予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。

“干活的没证,有证的不干这个活”

“简单算一笔账,以2018年起流行的非洲猪瘟为例,通过前端防控和有效干预,如果将生猪的病死率降低1%,相当于挽回600万头猪。”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党委书记孙研说。

“非洲猪瘟从非洲蔓延到欧洲用了50多年时间,从格鲁吉亚蔓延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,然而传入中国后几个月内就影响了很多地区。这凸显了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的预警能力并不匹配蓬勃发展的畜牧业。”孙研说,基层兽医队伍建设还相对滞后,待遇两极化、资源不协调、功能弱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基层兽医体系和从业者。

事实上,各地村级防疫员正在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。“大家都觉得这份工作又脏又累,还有受伤和感染人畜共患病风险。一年三四千元的补助,年轻人不愿意干,老的一辈之后恐怕没人愿意接班。”陈正博说。

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,提出“要逐步推行执业兽医制度”。2008年实施的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中也明确提出“国家实行执业兽医制度”,以法律的形式把执业兽医制度确定下来,随后各地开始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。

“甘肃执业兽医考试每年有1000人到1500人参加,由于需要专业知识门槛,通过率不足二成。”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何其健说,“尽管如此,许多通过考试的执业兽医并没有去基层一线工作,而是在城市宠物医院,为伴侣动物看病。”

考取了执业兽医从业资格的人,大多数是经过系统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,但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会去基层,而一些基层真正的从业者往往并不持证。“干活的没证,有证的不干这个活。”孙研说。

此外,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属于全额供给,许多非专业人员挤占了包括畜牧兽医在内的农业公益性服务岗位,导致一些公益性技术服务也没有直接服务于农牧民。

记者在甘肃多地走访了解到,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被纳入乡政府管理后,乡村兽医由过去的单线管理,变为由动物卫生监督所、农牧局、乡政府等多头管理。

“兽医站没‘户口’,我们就成了‘黑户’。”沈俊康说,基层兽医本就人手紧张,归乡镇政府管理后,日常琐事、杂事缠身,难以专注于业务工作,专业服务力量有些捉襟见肘。

“基层监督检查至关重要,如果第一道关把得好,动物疫病就能控制好,出现大规模蔓延的风险就不大。但是一边做日常行政工作,一边兼顾兽医相关工作,容易造成监督和服务缺位。”孙研说。

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忧,孙研建议国家要加大对动物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,从保障经济发展、保障养殖业发展、保障公共安全角度出发,实事求是地评估现状,适当增加动物防疫经费,合理配置人员和机构,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兽医的社会地位。

同时,优化执业兽医管理制度,对学历和知识结构设定合理门槛,每年以继续教育的形式对执业兽医进行培训和考核;充分发挥基层防疫人员的力量,让他们有意愿、有机会考取资质。

打造“同一个健康”方阵

20世纪40年代,以盛彤笙、朱宣人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,推动建立了我国现代兽医体系;改革开放至今,兽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,我国的兽医制度也不断地接轨国际水平。

专家表示,新形势下,兽医的职能范围正在从过去单纯诊治动物疾病,发展到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多个方面。

孙研说,面对动物源性传染病带来的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威胁,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,从动物源头进行控制,是最为有效和经济的方法,坚持“人病兽防”,也是保护人类免受危害的最佳途径。

“然而,我国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系统之间的合作关系仍然需要加强。”他说。

业内人士呼吁,面对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新发多发的形势,要尽快推动形成人类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的“同一个健康”方阵,在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上,充分发挥兽医的“预警人”作用。

20世纪80年代,美国流行病学学家卡文·施瓦布曾说过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”,借此警醒世人,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,人类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。

何其健说,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的防控,涉及若干领域和众多职能部门,要建立起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防控网络和合作机制,由市场监管、海关、文旅、交通、商务、卫生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参与。

“在现行制度下,最重要的是衔接人类卫生和动物卫生两个系统,整合力量,形成合力,共同抵御公共卫生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。”他说。

卖不掉放不了,商丘鸚鵡养殖陷“非法”困局

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鸚鵡在商丘已有30年历史。由于政策多次调整,特色养殖成为“非法产业”

省外部分地区森林公安部门,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由,多次抓捕经营费氏牡丹鸚鵡的销售商

业内人士呼吁尽快细化相关条款,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,也能够有效地规范人工养殖市场

本报记者宋晓东、杨琳

养鸚鵡30年了,咋就“突然”犯法了?在河南商丘,数百只鸚鵡养殖户眼下愁眉不展,还有点担惊受怕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,当地已有30年历史的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鸚鵡产业,已经多次被外地公安部门认定为非法销售野生保护动物。40万只鸚鵡销售受阻,相关人员被抓捕,众多养殖户资金链断裂,面临着“养不起”“卖不掉”“放不了”的困境。

大量鸚鵡积压、死亡

来到商丘市梁园区宁楼村,记者在村民王

翠兰家院外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鸟鸣声。三层高的房子,一楼住人,二三楼堆满了鸟笼,饲养着包括费氏牡丹鸚鵡在内的多个品种,但有的鸟笼已经空了。

王翠兰说,2019年刚投资20多万元扩建,没想到一年后就不让卖鸟了。现在家里的1000多对鸚鵡卖不出去,没有收入就买不起饲料,每天都有三四十只鸟被饿死。

在同村养殖户余福玲家,记者看到部分饲料袋已见底,给鸟做饭的蒸锅落满了灰尘。

“原来鸟喂得精细,每斤米拌上两三个鸡蛋放在锅里蒸熟,一天喂两三餐,现在都从地上扫点麸壳,一天吃不了一顿。”余福玲说,家里养了2000对鸚鵡,一个月光饲料费就要1.5万元,现在不让卖鸟,没有收入,鸟饿死几百只了。

已经养殖鸚鵡15年的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罗庄村村民张巍,同样遭遇“灭顶之灾”。以前家里存栏最多时有2500对,现在只剩下1700对。从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,一只鸚鵡都没卖出去,“为了养活这些鸟,我已经欠了快10万元的债了。”

商丘人工养殖费氏牡丹鸚鵡已有30年历史。商丘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,作为全国最大的鸚鵡人工繁育基地,商丘全市有鸚鵡养殖户837户,鸚鵡存栏量100万只以上,其中费氏牡丹鸚鵡约有40万只,养殖户近300户。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,江苏、江西等地公安部门陆续查获多起买卖费氏牡丹鸚鵡案件,认定为非法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溯源到商丘,已经有养殖户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记者从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,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由,对商丘鸚鵡养殖户进行拘留,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鸚鵡市场交易中断,养殖户销售链条

断裂,大量鸚鵡积压在农户。为节省成本,养殖户减少饲料投入。加之冬季低温,大量鸚鵡死亡,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。

政策几经调整,“特色养殖”沦为“非法产业”

记者采访发现,商丘当地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鸚鵡大多是外来品种,在历史上曾被纳入相关部门批准的可商业性经营野生动物名单,但由于政策多次调整,这一特色养殖逐渐成为“非法产业”。

记者调查了解到,原国家林业局在2003年曾颁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(林护发[2003]121号)中,规定费氏牡丹鸚鵡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。2003年以后,鸚鵡养殖在商丘快速发展,由于门槛不高,市场效益较好,养殖费氏牡丹鸚鵡成为商丘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创业致富的首选,养殖规模迅速扩大。

2012年10月23日,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公告废止了这一名单。2019年11月,费氏牡丹鸚鵡的保护等级由国家三级升为国家二级,无证买卖将触犯刑法。

部分养殖户反映,此前当地并未根据法律法规进行有效引导和管理。

“这些政策,我们之前都不知道,要知道犯法肯定不干。”余福玲说,“我们几百户也不是偷偷摸摸地养鸚鵡、卖鸚鵡,至少也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,不能突然就说我们犯法了,我们冤得很。”

记者采访还发现,由于费氏牡丹鸚鵡人工繁育时间较长,各地对其司法鉴定的意见

不一,造成了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。

商丘市森林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示,该局曾多次委托国家林草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,对当地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鸚鵡进行鉴定。由于繁育时间较长,产生很多杂交品种,出具的鉴定结果为“不确定具体种属”。作为刑事案件查办没有立案基础,因此商丘市森林公安没有查办过相关案件。但2019年年底以来,江西、浙江等地森林公安部门,根据国内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书,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由,多次抓捕商丘市经营费氏牡丹鸚鵡的销售商。

此外,商丘绝大多数养殖户没有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。不少养殖户说,不知道哪里可以办证,也没有相关部门曾对此进行督促、监管。

张巍表示,2012年他曾到商丘市行政服务办事部门咨询如何办理相关证照,但得到的回复是“不办理这类证件”。

养殖户夏玉华多年前向商丘市林业局咨询办证问题,也没有得到有效回复,“大家都没办证,而且二三十年了也没人管,我以为就是不用办证的。”

厘清法律模糊地带,尽快妥善处置存量鸚鵡

法律人士表示,这已不是国内野生保护动物领域第一次出现社会争议。由于一些人饲养物种是不是野生保护动物的司法认定较为模糊,导致执法层面不好操作,不利于基层司法实践。

河南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四化说,人工养殖的动物和与真正的野生动物之间的保护不当画等号。关于这一类问题,司法实践过程当中,过去的裁判尺度不一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指导意见,但是关于人工饲养动物与野生保护动物之间,如何有效、准确地区分,没有相关的指导性文件。因此,呼吁相关部门尽快细化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条款,准确界定人工养殖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分标准,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,也能够有效地规范人工养殖市场。

不少养殖户也呼吁应将买卖养殖鸚鵡和野生鸚鵡区别开来。余福玲说,同样都是养殖,猪、鸡、鸭、羊、牛可以卖,卖自己养的鸟就犯法,这个道理说不通。

“现在养的费氏牡丹鸚鵡确实是我们一代一代人工繁育的,国家可以鉴定,不能‘一刀切’地判定我们违法。”养殖户刘忠耀说。

针对目前大量费氏牡丹鸚鵡处置难的问题,养殖户急切盼望地方政府尽快出台政策,帮助解决。

夏玉华说,鸚鵡是活物,活一天就要吃一天,如果到春节还解决不了,我家1000多对鸚鵡就死光了。“就是不算钱的账,鸟再小也是命,眼睁睁看着饿死了,心疼啊。”王翠兰说。

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,已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商丘养殖费氏牡丹鸚鵡的实际情况,争取允许人工繁育种群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;当地还拟协调一定补偿资金,对鸚鵡进行妥善安置,并对养殖户中受影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合理补偿,避免返贫。